



董登新：三孩政策破解“少 子化”难题



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董登新（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）

从实行一孩政策到如今的“少子化”，我们仅用了不到 40 年的时间，与此同时，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，预计“十四五”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，2035 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，这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、社会建设各环节、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。

2016 年底，我国 60 岁以下老年人口首次超过 14 岁以下青少年人口，这是“少子化”的开始，也是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。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，我国 0-14 岁人口为 25338 万人，占 17.95%；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，占 18.70%。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已明显超过青少年人口占比，究竟是老龄化导致少子化、还是少子化导致老龄化？我认为，问题源头主要在“少子化”。少子化是“老龄化”的另一面，今天党中央、国务院正在依法破解这一难题。

1980 年 9 月，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明确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，随后党中央向党员、团员发公开信进行提倡，这标志我国一孩政策正式出台并全面实施。1981 年，我国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。1982 年，党的十二大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。

正因如此，1981-1997 年，我国每年新生人口一直稳定在 2000 万至 2500 万之间，然而，1998 年陡降至 1942 万人，这是我国新生人口自 1981 年以来首次跌破 2000 万人的水平线，并且随后一路下滑：1999 年为 1834

万人，2000 年为 1771 万人。

随着我国新生人口持续减少，2002 年政府提出“双独二孩”政策，即提倡一孩，经批准允许部分二孩，严禁超计划二孩及多孩。直至 2011 年 11 月，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，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。但政策效果并不明显，2002 年我国新生人口继续下降为 1647 万人，2003 年再降为 1599 万人，2006 年进一步降至 1585 万人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记录。

不过，随后的 2007-2016 年我国新生人口经历了十年的小幅回升，2016 年我国新生人口增至 1785 万人，是自 200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其间，2013 年 11 月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，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，这一“单独两孩”政策逐渐落地实施。2015 年 10 月，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，一对夫妻可生两个孩子（俗称“全面二孩”政策）。

然而，由于新的生育政策缺乏配套激励措施，没能发挥应有的政策作用，我国新生人口再次转入了大幅下滑态势。2017 年我国新生人口为 1723 万人，2018 年陡降为 1523 万人，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最低记录，2019 年更是下降为 1465 万人，2020 年大幅降至 1200 万人。

回望历史，1998 年是我国新生人口的重大历史转折点，从这一年开始，我国新生人口不仅跌破了 2000 万的关口，而且还出现了不断下滑的长期趋势。这一年确有两件大事发生，这应该是纯粹的历史巧合：一是 1998

年高考大规模“扩招”，中国大学教育开始走向平民化普及阶段；二是1998年城镇拉开“房改”序幕，我国房地产大开发正式启动。



事实上，大学教育的普及，一方面改变了我国劳动者的素质和结构，另一方面，上大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，人人上大学成为每个孩子人生的必修课，当然，这也加大了家庭养育孩子的预期成本。

与此同时，房改与房地产大开发，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城镇住房私有化比率，甚至一个家庭拥有两 three 套商品房已十分常见，人们买房不完全是为了自住，而是作为一种投资或财富储备，这种“囤房”很显然是畸形的，它迫使年轻人结婚必须先买房，买房结婚似乎成为了一种社会时尚。这极大地提高了家庭养育孩子的预期成本。

实际上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与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，生养孩子的预期

成本也在一路飙升。“生不起、养不起”正是迫于未来支付能力的预期不乐观而形成的悲观生育态度，由此而引发的“不想生、不愿生”更是一种消极、自私的生育态度，这些人认为，与其辛苦艰难生养孩子，不如独享二人世界、快活自在。这也是当代年轻人不愿生养孩子的真实心态。

事实上，我国生养孩子的预期成本正在不断地被人为推高，至少包括以下四大类：

（一）从怀孕到入托前的预期成本

怀孕保胎可能需要家人侍候，甚至要经常向单位请假；婴儿出生后进月子中心，一个月至少需要三、五万，如果聘请月嫂也要上万或更多；国家现行规定产假为 98 天，在产假期满、上托儿所前，这段时间如果聘请育婴嫂每月费用至少也需要 5000 元以上。在这一阶段，新生儿家庭所要解决的不完全是“钱”的问题，由于月子中心、月嫂、育婴嫂或保姆在职业上仍缺乏可靠的统一资质认证与信用档案管理，这不仅使得雇佣成本高，而且还存在较高的信用与安全风险。因此，许多年轻父母宁可辞职带娃，或是辛苦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，也不肯聘请职业化、专业化、社会化的家政工或保姆。这无形加大了家庭及长辈生养孩子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。

（二）托儿所与幼儿园预期成本

由于用人单位对产假的包容是有限的，一些中小企业甚至不接受国家法定的产假，私自克扣产假，与产妇员工达成上班协议，如果不接受只能

自动辞职，因此，尽早将婴幼儿送入托儿所，几乎是所有年轻父母的心愿。

在托儿所发达的国家，婴儿在半岁或十个月就能进托儿所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产妇及家庭的育幼压力和心理负担。

然而，在我国，公立托儿所少得可怜，私立托儿所收费太昂贵，为此，大多数婴幼儿在三岁前基本上要在家请保姆照顾，或是请孩子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，这是托幼阶段最大的麻烦和家庭负担。

我国幼儿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，想进公立幼儿园，必须托人找关系，更不要说好的幼儿园了，而私立幼儿园普遍收费较高，而且距离较远，接送孩子很不方便。

由于公立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极度短缺，年轻的父母尚未怀孕就已开始焦虑：孩子将来在哪里上托儿所和幼儿园？是否能找到关系？由此可见，入托入幼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找不到满意的托儿所和幼儿园。

（三）中小学教育与学区房焦虑

“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，这是当今家长的焦虑，更是对培育孩子的焦虑。由于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，而且受教育机会必须与户籍相捆绑，这让教育公平变得更糟糕，一些中小学出于“升学率”的考虑，私下设置入校门槛测试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孩子们公平受教育的机会，也有悖义务教育的本源和初衷。

为了达成小孩上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的愿望，不少家庭临时抱佛脚，

通过购买学校周边的高价房,以获得户籍入学资格,进而形成了畸形的“学区房”现象,一些投机客也大量买入“学区房”,囤积居奇,专做倒腾“学区房”的买卖,哄抬房价,扰乱学区秩序。

很显然,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好的小学和中学,不少家长攒钱买房就是为了买上学户口,提前透支了育儿开支,并过早、过度承受了沉重的教育成本。原本是“义务教育”,最终却变成了昂贵的“贵族教育”。这也是生养孩子的无形压力与经济负担。

(四) 大学教育与成家立业压力山大

现如今,大学教育已经平民化,但大学仍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。考入一所理想的重点大学,就意味着能有一份好工作、好前程。因此,十年寒窗苦读,都在拚一所好大学,这既是孩子的巨大压力,也是父母的无形压力。

与国外大学四年百万的成本相比,我国大学收费是非常便宜的,因此,在中国上大学不是钱的问题,更重要的是学校的档次及工作单位的选择。

这种心理压力与目标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

预览已结束,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:
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2875

